

# 明代杭州的资本主义萌芽与市民斗争

林 正 秋

杭州，在南宋时期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城市经济极其繁荣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但从一二七六年元军攻下临安，一直到一三五六年张士诚领导的农民起义攻克杭州止，在整整八十年时间里，杭州受到元朝统治者的野蛮统治，社会经济受到很大摧残，市政建设也严重荒疏，城内外水道年久失修，尤其是龙山河道的壅塞，直接影响客旅的往来，城内米价昂贵，居民叫苦连天。景色秀丽的西湖也开始淤塞。“沿湖四边泥淤之处没为茭荡，属于豪民；湖面一带葑草侵塞，湖西如野陂然。”（注1）再加上杭州多次遭到火灾，特别是一三四二年（至正二年）那次火灾，烧毁民房四万多间（注2），造成“闾阎十室九空。”（注3）元朝后期，情况虽有所好转，但杭州的元气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到一三六六年底，朱元璋的大将常遇春带兵进攻杭州时，又在此激战三个月。“各路粮道不通，米价涌贵……一城之人，饿死者十有六七。军既退，吴淞米航凑集，聊藉以活。而又大半病疫死。”（注4）这一切都雄辩地证明：明朝初期的杭州还远不如南宋时的繁华。

明朝建立后，废除元代的“江浙行中书省”而置浙江省布政使司，辖境与今日浙江省大致相同。杭州则改为府，作为浙江的省会，其下仍辖钱塘，仁和等九县。

由于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巨大智慧，加以明朝建国后，社会相对稳定，明朝政府又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因此，全国的社会经济又逐渐发展起来，杭州也象一个大病初愈的人那样，慢慢从元代的严重摧残下复苏过来了。到明代中期前，全国较大的商业、手工业城市已有三十三个，杭州也是其中之一<sup>⑤</sup>。一些传统的手工业生产，特别是丝织业和造船业，又在杭州恢复并进一步发展起来。到万历年间（一五七三——一六二〇年），原先那些“草深尺余”、“孤兔为群”的近郊僻地，也已“居民栉比，鸡犬相闻，极为繁庶”<sup>⑥</sup>。

杭州的丝织业素称发达，见于记载也有二千年左右的悠久历史。唐代少府监把全国所产的丝绸按质量好坏分为九等，杭州所产的绉、缕纱列为第四等。五代时期杭州成为越国的首府，设有官府织造局，内有织棉工三百多人<sup>⑦</sup>。北宋太宗至道年间，又在杭州设织务局，专门收购杭州等地的丝织品，以供宫廷消费。明代政府也在杭州设立了织造局与官营机房，地址在今红门局附近。据《嘉靖浙江通志》载：织造府二，并在布政司东旗纛庙西，左为东府，右为西府，以中官掌之。洪武二年建织染局于此（指太平坊）永乐中因地势卑湿，分拨工料于涌金门建局织造，遂以旧名南局，此名北局<sup>⑧</sup>。织染局的范围很大，内有官吏办公及仓库七十余间，机房一百廿余间，官私织机约五百张左右<sup>⑨</sup>。年产也达数万匹。私营作坊更是到处可见。城东及东北是丝织业集中之地。城北近西湖的“张纱街”有个别叫蒋昆丑的作坊主，以丝织为业。他织造一种“皓纱”，团花疏杂，轻薄如纸，质量很高，驰名京师。所

以杭人称这一带为“蒋纱衙”后来因蒋、张音近，渐被人们误为“张纱衙”了。<sup>⑩</sup>此外，相安里、忠清巷私营作坊也相当密集。如忠清巷有一通圣庙（今忠清巷小学）附近大都是“织绫锦为业”的居民<sup>⑪</sup>。当时称丝织工场主为“机房”或“织户”，称操作的工人为“织工”或“机工”。工作地点称“机房”。在“机房”工作的有“常工”与“临时工”之别。

明代时，杭州所产的丝织品种繁多，质量精佳。据《嘉靖仁和县志》卷三《物产》所列帛品有：缎、罗、棉、剪绒、绉绦绫、绉（绸）、绢、纱、縠（邹纱）等十余种类。据载，洪武十年（一三七七年）杭州及所属九县夏税丝额为二万五千五百九十斤，到成化八年（一四七二年）夏税丝额六十一万四千二百十斤，在一百年内夏税增加二十五倍之多<sup>⑫</sup>。税额的增多又是丝织业发展的佐证。

杭州的丝织品运销福建，江西及西北等地，如江西铅山的丝商还专门来杭收购丝织品。不少地方又开有专门销售苏杭的丝织品商店，如宣府就没有“苏杭罗缎铺”。<sup>⑬</sup>杭州的丝绸不仅受到国内市场的好评，而且还远销国外。据《越镌》载，在万历年间，郑子明、沈云凤等商人，在杭大量纺制“哈喇缎”等丝织品，违反海禁，勾结倭寇走私日本、暹罗及吕宋等地，获利甚厚，成为杭州最大的“渠魁”而受到浙江布政司的审讯，成为当时“通倭”的三大案件之一<sup>⑭</sup>。另外，福建商人杨才甫长期住杭与本地商人张玉宇等三十余人合伙贩卖杭州细绢到日本，牟取二倍的厚利<sup>⑮</sup>。郑和下西洋时，也曾带去大批杭州绸缎，赠送所到各国并得到各国的好评。

杭州的造船业也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东晋南朝时期，由于钱塘江航运的发达，造船业也随之发达。到了明代更有进一步的发展。湖船、游船的制作更加精致，式样更加翻新了，而江舰海船也比以前造得更大。钱塘宝船厂和仁和县谢村的造船厂，就是当时杭州最著名的两家造船工场，特别是谢村造船工场规模更大，据记载，该厂租地旁附，搭厂数十（注16）即有数十间厂房，是当时有名的造船工场，每年能打造巨型海舰五十余艘，所制造的“基山”船，大者能载重七、八百石、小者三、四百石。这些船曾在台州渔民的驾驶下在抗倭战争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明代中叶以后，杭州的商业已很繁荣，城内有近半数居民开店经商，街道上商店林立，货物充盈，一派繁华景象。

明朝中叶前后是我国封建社会内部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这在杭州也同样如此。当时，在丝织业中首先出现了工场手工业。曾作过在杭州府学教授的徐一夔在所著《织工对》中，曾记载了机户与织工之间的关系。有一位熟练织工、技术精湛，而所得报酬却与别人相同，他对此很不满意，就要求机户增加他的工资，但遭到了拒绝；于是这位工人就另找了一家工场，那家工厂的机户见他的技术熟练，织品精巧，盘算了一下之后，认为“得一工胜十工矣”，就同意了这位工人“倍其值”即拿双份工资的要求。这个记载说明，当时机户与工人之间已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工人已可以自由地离开工场另找门路，而不同于封建生产方式中行会老板与工人之间关系了。这表明：明代中叶在杭州的丝织业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关系。

这些纺织工场获利甚厚，工场主往往不几年便发财致富。如张瀚在《松窗梦语》卷六中《异闻记》中就记述了他的祖先怎样从一个小作坊主发展为“家富几万金”的过程。他家原是酿酒的，一四七一年（成化七年），因遇水灾，家中所酿的酒全被糟踏，酒场无法再开下

去了，张家便购买织机一张，生产各种帛。由于织得很精巧，所以下机就马上可以售掉，每匹可以获利润五分之一。于是过了二十天又增购一张织机，这样一直增到二十余张，生意一直十分兴隆。“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

与机户大发横财形成鲜明的对照的是，广大的织工生活却十分悲惨，贫困。他们身受封建官僚、商人与机户的重重剥削与压迫，辛苦一天，却只得到一二升米的工资。那时苏杭一带流传着一首民谣：“梭子两头尖，歇落无饭钱，织的绫罗缎，穿的破烂衣。”就是织工悲惨生活的如实写照。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徐一夔也讲到他自己亲自遇到的一件趣事。他住在杭州城内相安里时，附近有一家纺织工场，工人生产，徐氏每天晚上直到深夜，听到那里闹声盈耳，他以为这是织工们的欢乐声，不禁赞叹：他们多快乐啊！但有一天早上他到这家工场去看，却和他的赞叹迥然异趣，只见破旧的房屋仿佛就要倒塌，里面从南到北安着四五具纺纱机，有十几个工人在那里手提足踏，吃力地劳动着，一看他们的脸孔，“皆苍然无神色。”（注17）。张瀚家的“各富至数万金”就是建筑在织工们被剥削压榨得“苍然无神色”的基础之上的。

明代中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市民阶层的人数和力量逐渐壮大起来，市民与手工业工人们的斗争也随之接连发生。

公元一六〇三年，杭州发生过织工与市民反对封建官僚鲁保的斗争，天启年间（一六二一年——一六二七年）发生过“何伟然树万人一心之旗于杭郡”的事件（注18）。特别是一五八〇年（万历八年）由丁仕卿领导的一次市民起义，更震动过明朝统治者，显示了市民群众的威力。

明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城市的控制，曾强迫杭城居民“编派巡警夫役”即轮流值夜。每逢值夜之日，通宵达旦，不能休息，严重地影响到次日的工作。“民间累苦，莫甚于斯，”（注19），市民怨声载道。嘉靖（一五二二年——一五六六年）后期，教读丁仕卿寓居钱塘，看到这种情形，就上书言事，建议“出银雇役”，即由每家按贫富分为三等捐出银来，雇募“总甲”、“火夫”等担任巡夜的差役。这一办法行了十多年之后，明朝官僚忽又籍口倭寇骚扰，为了侦缉防奸，把居民所出的“雇役银”拿来用诸于起造巡警铺和设立栅木，而晚间值夜仍要各保甲人户轮流充任。这样，杭州市民既要交纳雇募火夫的“间架税”，仍又巡夜，对政府强烈不满。在一五八〇年四月间一次巡夜之中，又正好遇到一个官吏家里被盗，官府严责值夜的巡警火夫，引起市民的更大不满，教读丁仕卿就再次奔赴京师，替杭州市民鸣不平。结果反被逮捕，押回杭州，带枷示众。这就更进一步激起了市民的愤怒，众人纷纷议论说：丁教读是为了我们而“得罪”的，我们决不可坐视不救！于是有数百人一呼而起，向官府评理。在群众的压力下，官府被迫假装释放丁仕卿，实际上却把丁氏偷偷地押送省提刑按察使司（主管一省的司法机关）。四月廿九日，市民得知这一消息，再次集会营救丁氏。当时群情激愤，响应者增达千人。愤怒的人群首先放火烧了“独不受役”的沈廩等四十余家豪绅的房屋，夺走了他们的财产（注20）。接着人群又涌向巡抚衙门，大小官吏逃之夭夭。新任巡抚张佳胤正在途中赶路，刚到加兴就听到省城“民变”的消息，星夜急奔杭州，于五月初一日赶到匆忙上任。就在当天晚上，市民二千余人，打着金鼓，举着旗帜，手持白刃，涌向巡抚衙门，焚烧文书，并将新任巡抚张佳胤围困于市集中。张佳胤先用威胁的手段，妄图把市民的斗争强压下去，他吓唬市民说：“你们不得造反！谁敢造反的话，我立即调集大兵来，把你们都抓起来，并且连你们的亲族也受连累，要把你们灭族！”（注21）。但群

众不受其吓，张佳胤见威胁不成，就变换手法，装出一付悲天悯人的嘴脸，假惺惺地问民疾苦，并立即下令免除巡夜之役，企图收揽人心，劝诱市民解散。但市民在丁仕卿的率领下，识破其奸，不受其骗、并计划发动公开的武装起义。

这天夜里，张佳胤见城中火光冲天，市民集结不散，连忙起草安民告示，欺骗群众。文告刚贴出，市民就立即把它撕破。张佳胤见威胁和欺骗都不成，就撕下假面具布置血腥镇压，次日的中午，便派营兵遍布菜市桥、褚家塘、官巷口、章家桥等地，用出其不意的手法，突然围攻市民。经过激烈的战斗，丁仕卿等一百五十余人被俘，其中五十二人梟斩示众，丁仕卿等系狱病死。这次轰轰烈烈的杭州市民起义就这样被刽子手张佳胤镇压下去了。但是这次市民起义，有力地打击了明代的封建统治、震动了整个东南地区，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市民阶层作为一支新产生的革命力量，正在走上历史舞台，表明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在局部地区里，阶级关系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这种变化给整个中国社会及以后的农民起义都带来了新的因素。

作者附记：本文是以《杭州与西湖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出版）中一节为基础扩充而成的，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杭州大学历史系郑云山、龚延明两位老师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1）见《杭州府志》卷五十三《水利》

（注2）见《嘉靖仁和县志》卷十四

（注4）《辍耕录》卷十一《杭人遭难》

（注5）这三十三个较大的工商业城市是：顺天（北京）、应天（南京）、镇江、淮安、苏州、松江、常州、扬州、仪征、杭州、嘉兴、湖州、福州、建宁、武昌、荆州、南昌、吉安、临江、清江、广州、开封、济南、济宁、德州、临清、挂林、太原、平阳、蒲州、成都、重庆、虚州。

（注6）《万历杭州府志》卷一

（注7）《吴越备史》卷一

（注8）李卫撰《雍正浙江通志》卷三十《公署·织造局》。

（注9）《明清史料》丙编第三册《顺治四年正月工部侍郎佟国胤等揭帖》载，杭州“织局订止二十余年，机房颓坏无存，匠役逃亡甚多，”尚存“官机三百张，民机一百六十张”。

（注10）黄士珣《北隅掌录》卷下《张纱衙》条。

（注11）姚震《通圣庙碑记》，见《嘉靖仁和县志》卷三。

（注12）光绪《杭州府志》物产单行本。

（注13）王在晋《越镌》卷二十一。

（注14）明神宗《万历实录》卷四九六。

（注16）《嘉靖和县志》卷十四。

（注17）冈上

（注18）明熹宗《天启实录》卷三十五《王允成疏》。

（注19）吕坤《实政录》卷二《清编火夫》。

（注20）《万历武功录》卷二《上虞叛民丁仕卿列传》。

（注21）方孔炤《全边略记》卷十一。